

主题栏目: 民国史新论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

[美国] 柯伟林

(哈佛大学 历史系, 康桥 MA02138)

朱 适, 陈红民 译

[摘 要] 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 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史学界主流所认可。事实上,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 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自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 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 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 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要研究那个时代中国国际化的历史, 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 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关键词] 中国; 民国时期; 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7)01 - 0016 - 03

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William C. Kirby

(History Depart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02138, U. S. A.)

Abstrac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odern China has been rather unfashionable in West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for much of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fact, in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China has been its incorporation into global system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an China in 1912, China has been shaped in often decisive ways by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wider world—just as China has helped to shape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s simply incomprehensible without a strongl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f we are to study this era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we cannot separate the internal from the external; rather, we should aim to examine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China; the Republican Era; internationalization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对于中德关系的理解随着大量原始档案的开放而大大丰

[收稿日期] 2006 - 10 - 2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柯伟林(1953 -), 男, 哈佛大学历史系盖辛葛尔讲座教授(Geisinger Professor of History), 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译者简介] 1. 朱适(1976 -), 男, 江苏苏州人, 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教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 2. 陈红民(1958 -), 男, 山东泰安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

富,学者们从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馆(尤其是前苏联,特别是前民主德国档案馆)中发掘出许多新的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以拙著《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为开端,目前关于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已经有三十多本中文或德文的论著出版。

围绕民国时期中德关系这一主题发掘的大量新原始档案,产生了新的治史方法与成果,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德双边关系。但如果我们开阔眼界与思路,就会发现中德关系背后有着一个更重要的、更为宏大的问题,即中国现代的国际化问题。《德国与中华民国》最初拟订的书名是《外国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思路就是要以中德关系为例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外国因素,而限于弄清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笔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清朝和中华民国(包括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向其他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经验的优势。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当时中国的领导者面临着非常多的可供选择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时以“主义”的形式出现,“主义”是指公认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或哲学概念。但这些主义(包括共和主义、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列宁主义等)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脱离于其各自不同的国家渊源。概念不是光有纯粹抽象的包装,而是同时包含于个体和国家的经验中。笔者认为,在国民党的南京十年统治时期,虽然德国的影响很大,但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没有一个单独而孤立的“德国模式”(German model),而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重要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并且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这些模式受到从被称为“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冒险家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到其雇佣者——信奉墨守成规儒家学说的军阀蒋介石等不同的人物和从中国研究学社到同济大学,再到国民党自身等机构这两方面的制约。

在《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里,包含着笔者一直试图明确表达清楚的观点,即现代中国一个本质的,也许是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它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考察,我们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1928年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是一个中国现代化政党,但是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它又是极为国际化的,更不必说它的军备武器(那些武器早期基本上从国外进口)。同样,国民党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其言行也受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

笔者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到20世纪为止,国际的或全球的,又或者国外的事情和“中国”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在很多领域已经不可能简单清晰地划分了。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际化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这并非意味着那个时代国际化的影响是施加给中国的。笔者目前致力于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那段历史说明,国际共产主义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张性,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者们自主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领导人的革命生涯既是国际性的,又是民族性的。在中国国内,就这些政治活动、经济组织、法律和监狱系统或者其他而言,我们都不该用“施加”这个词,而该用国际文化通称的“内卷化”(internalization)。并且,我们至少必须假定中国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国际影响这两者应该具有相等的作用力。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独特理解,充分说明了这种论点的正确性。

必须坦率地指出,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所认可,尽管目前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笔者对中华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是有意识地遵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的多国、多档案的国际史研究传统来进行的,并试图从多种角度和多个正式或非正式参与者的观点来理解国际关系。在费正清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现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处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那时,费正清的老师蒋廷黻已经制定了现代国际史的撰写标准。然而,关于中国现代国际史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

落,当时中国和一些西方学者均批判费正清等学者所持的是一种从外部来看待中国的“帝国主义”观点,它不能解释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内部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据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真正动因。后来,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之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观在学术研究的发展上,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过分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不仅阻碍了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化进程,还妨碍着我们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被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既是一个伟大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同时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从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它的发展面貌,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关于中国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获得了复苏,毫无疑问,这部分地要归功于中国在上世纪持续迅速提高的地位,以及更加迅速的国际化步伐,还有中国及海外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最近由中国北京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的关于中国国际化的跨国研究课题就是一个例子。

当从事这个课题时,我们寻求在中国国际化的研究中设定两个新的议题:第一个是上文所提到的国际文化通称的“内卷化”。我们要问,如何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某些领域持久的生命力?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起重要作用的列宁主义。当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时候,又能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研究中学到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早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就已在与外国的联系过程中成熟了,而后又在中国东南沿海外围地区繁荣壮大。中国 20 世纪的三次法律改革浪潮在何种程度上“内卷化”了国际上的法律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中国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目前及将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自然环境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中国在一个农业、工业和工程大规模国际合作的世纪中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的?第二个宽广的目标,也是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相对主要的目标,就是如何在世界和地区的背景下看待中国。在该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成员资格已经重新定义了全球社会及其惯例。除去众多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中国一些个人也拥有这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外,中国作为共产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国联和联合国等众多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其影响是什么?笔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很显著的。尤其是民国时期,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主流看起来颇为显眼的文化国际主义,对于中外伙伴关系以及中外敌对状态性质的定义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还需要解释,尽管学术界存在着诸多关于中国“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的历史论述,但 20 世纪中国真正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的时期,实际上仅仅是从大约 1962 至 1970 年的几年时间,而且这种孤立状态的例外情形正好可以证明中国国际化这一规律。

在看待中国现代历史的国际化维度时,笔者更愿意使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而非“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和政府对于 20 世纪中外关系无论是从私人还是公众的角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是在国家之间且跨越公认(尽管有时存在争议)国界的不可避免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且国家和政府对非政府个体参与者的许多活动还进行调停斡旋(以及监督)。“全球化”这一概念的预设是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不断趋同,它没有考虑如下事实,即文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及交通、通讯和贸易方面的革命所产生的变化迅速,后者的变化促使人们相互联系,又往往使彼此间发生冲突。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中德关系的历史描述中。笔者对这段历史着迷,是因为这段国际关系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而且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它还涉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诸多方面,比如合资企业、经济和教育,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国界传播等。有时政府及领袖们对于这种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开始时至关重要,但到最后却是悲剧性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并不是什么非人力的因素,而是人类自身往往由于不完整的信息、太多的目标,并且时常戴着无法改变的意识形态的眼罩,影响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